

● 开放丛书

中青年学者文库

邓英淘集

——求实·发展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邓英淘集

——求实·发展

邓英淘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年·哈尔滨

邓英淘集

——求实·发展

邓英淘 著

责任编辑：华 盛

封面设计：陈少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0.25 · 插页 2 · 字数 250 千

1989年5月第1版 ·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16-0726-3/C · 23 定价：3.70 元

313077

自序

从个人气质上说，我也许并不适宜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实际上，自己走上今天这样一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偶然性。

记得少年时期，由于受家庭和环境的熏陶与影响，我最喜欢读的书大部分与历史、军事、政治有关。那时自己所向往的事业是铁马冰河、开疆拓边……；而这些历史业绩中闪烁着永恒异彩的奇谋睿智，又激发了我对推理与数学的历久不衰的偏好。后来，尽管少年时代的志向为国家命运的激变所中断，但我为实现自己这种志向所做的准备——历史感和战略观，并没有随之而付于东流。

十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那时，自己身在其中，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生活的磨炼使自己养成了注重实际和调查研究的习惯和意识。同时，现实使我萌生和强化了学习经济学知识、理解经济生活的愿望。在这十年里，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现象，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实感和思辨能力，阅读了《资本论》三卷和当时能找到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介绍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小册子和有关的哲学书籍。这样一段生活经历使我受益非浅，并对自己迄今为止的研究生涯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大学期间，我在受到经济学方面系统训练的同时，还旁听了数学系三年半的课程，从而为我以后了解、学习和运用前沿科学的知识于经济学研究中，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尤为令人难忘的是，我在 1980 年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筹建和研究工作，并亲身参与了中国农村变革的某些具体工作，使自己在各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研究工作的延拓，我的眼光也逐步转向与农村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长期发展方式问题。

说到底，一个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与他所处的环境和历史过程息息相关。实际上，这本书正是在发展组这个熔炉式的集体和农村变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收集了我从 1981 年至 1988 年初所写的 20 篇文章。在整理这些文章时，只对极少数技术性方面进行了修改，其他均保持原貌。时过境迁，其中有些观点和看法肯定已不尽然，但想必读者在批评之余，能持一两分谅解的态度。初出阵的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但也要不断地生长起来才好！但愿自己做到了这点。

熙攘的争斗和浮华的言词终归是过眼云烟。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惟有那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善于学习、借鉴和创造，有眼光、有理想的民族才有将来。这个道理对于个人来说，想来也不会例外。

作 者

1988 年 6 月



邓英淘

作者小传

邓英淘，1952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湖南桂东。1968年至1978年在农村插队十年。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参加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2年至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现为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论著有《经济控制论》（1984年，与何组凌合著）、《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和演化》（1985年，与何组凌合著）、《走向现代化的抉择》（1987年，与周其仁、罗小朋等人合著），主要译著有《经济控制论》（1985年，与何组凌、罗小朋等合译）、《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1988年，与向宁合译）。

313077

邓英淘集 求实发

登 记

313077

- 1 为了充分便利读者和提
利用率，读者借书应按
- 2 图书不得污损、折角、
毁或遗失，否则照章处

编委：

王晓明 刘敏中
李景瑞 何 新
张文达 张 莉
唐 欣 高质慧
戢克非

(按姓氏笔划排列)

目 录

自序

第一辑 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研究

“双包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前景问题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	(3)
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和经济政策	
——江西省吉安地区农村调查专题报告	(16)
我国粮食供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33)
城乡经济关系的几种可能前景及其对国民经济总增长的影响	
.....	(55)
强化中央调控能力的必要性分析	(65)
强化中央调控能力 实施结构性对策	(79)
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农产品价格	
——收入支持计划的主要措施	(104)
现代化与中国体制改革的求解程序	(111)
论总量分析和总量政策在我国经济	
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性	
——兼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些基本特征	(129)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辨析 (154)

第二辑 边缘学科的应用研究

论战略研究 (167)

论战略的本质特征 (185)

经济控制论系统的状态

行为和功能的一般描述 (200)

耗散结构与经济系统 (208)

耗散结构理论与产业结构的演化 (232)

第三辑 新发展方式的研究

在双重压力下选择长期发展方式 (251)

恩格尔定律的微观基础及其自然推广 (269)

广义恩格尔定律 (278)

对经典发展方式的重新反省 (295)

由《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所引出的思考 (314)

第一辑

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研究

“双包到户”后的粮食生产前景问题

——安徽省滁县地区农村 调查专题报告

目前，国际市场上粮食需求量迅速上升，而供给则相对缓慢、波动地增长，价格继续坚挺。据估计，今后十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将难于大幅度增长。

我国现有 10 亿人口，至本世纪末将达到 12~13 亿人。因此，根本无法靠进口粮食解决吃饭问题；且由于粮价上涨，应该力求减少粮食的净进口数量。目前，我国人均占有粮食 600 斤，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因此，今后二十年粮食生产的状况如何，不仅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多种经营的机动性；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的稳定和发展，整个战略发展上的主动地位，都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解决，不容有稍许的放松。

现在，我国农业中已有 50% 以上的社队实行了双包到户，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从全国的情况看，实行双包到户的大部分地区，两、三年内粮食生产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已为事实所证实。但是三、四年之后，粮食生产的前景如何？工、农业产品的比价，粮食作物与其它作物的比价，粮食生产的经营方针等问题，及其对粮食生产持续增长有何影响等问题，我们应予以

足够的关注，认真进行研究，并逐步加以解决。

为此，我们对已实行双包三年的滁县地区的粮食生产的历史、现状以及今后的前景进行了概略的考察。

应该提出，由于有些统计数字很不准确，且缺少很多项目的资料；调查的时间、人力极其有限；而粮食生产所涉及的技术、经济、政策等问题又非常复杂，所以，此报告只能为滁县地区今后粮食生产的总趋势和该区所呈现出的某些一般问题，提供一些调查者个人的粗浅意见。报告中所述数字和方案很难作为科学结论的佐证，也不是科学预测，而只能作为估计该区今后粮食生产发展上限和下限的一点参考。

一、1949年至1978年粮食生产的 几个阶段以及影响粮食生产 变动的主要因素的初步分析

第一阶段，1949年—1957年，粮食生产基本上是逐年上升。1949年粮食总产量为8.35亿斤，1957年为18.96亿斤，其中1955年最高，达19.4亿斤。8年间年总产量净增10亿斤。

这个时期，党在农村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上的互助合作化运动，顺应了民心。生产关系的变革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并且不断转化为现实的技术措施和物质生产条件。增产的主要因素如下：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由1949年的7,108,851亩，增至1957年的8,331,237亩，增加了120万亩（粮食面积的净增加数同此）。复种指数由1949年的1.26提高到1956年的1.76。水田由1949年的3,579,000亩上升到1955年的4,638,240亩（净增100万亩）。工程蓄水量由1949年的3.4亿立方米，增至

1957 年的 5.3 亿立方米，增 0.56 倍。有效灌溉面积由 1949 年的 98 万亩，增至 1957 年的 156 万亩，增 0.6 倍。粮食产量增 1.3 倍，农业总产值增 1.1 倍（1949 年为 1.06 亿元，1955 年为 2.27 亿元）。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对已形成的生产条件和利用是比较有效的。同时，从统计数字还可以看出，象农机（农机总动力由 1950 年 99 马力增至 1955 年的 1,089 马力）、化肥（由 1951 年 43 吨上升为 1955 年的 537 吨）等现代化生产手段的作用还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阶段，1958 年—1962 年，粮食生产逐年下降。1958 年总产 14.58 亿斤，比 1957 年净减 4 亿斤。1961 年降至最低点：8 亿斤，比 1949 年还低。5 年时间，粮食年总产量净减 10 亿斤。

这个时期，生产关系的大破坏是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生产者的积极性荡然无存，表现在生产上，一是已有的生产条件闲置和破坏（如耕地面积降至 1962 年的 730 万亩）；其次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频繁剧烈，1959 年受灾面积达 500 多万亩——是解放后迄今为止最厉害的一年。人怒天怨，整个农业生产濒临崩溃边缘。

第三阶段，1963 年—1965 年，是粮食生产的恢复时期。1962 年，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制定了“八字方针”，颁布了六十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经过三年调整，农业生产从灾难中得到恢复。1963 年粮食总产量为 11.8 亿，1965 年达到 14.1 亿斤。

第四阶段，1966 年—1978 年，粮食生产相对缓慢地波动上升。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农村中，政治运动的干扰时起时伏，粮食生产几起几落。1966 年粮食总产 11.8 亿斤，比 1965 年下降 2 亿多斤。然后开始逐年上升，1971 年为 17.8

亿斤。1972年第一次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55年),达到21亿斤。1973年又大幅度增长至26亿斤(气候很好)。1974年、1975年气候也不错,但粮食总产却下降为25亿斤和23亿斤。197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28.3亿斤。

在这个时期中,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变。工程蓄水量由1955年的4.6亿立方米增至1978年的18.8亿立方米,增长3倍。有效灌溉面积由1955年的139万亩增至1978年的405万亩,增长近2倍。(注意将这两个数字与第一阶段的这两个指数对比)。化肥由1955年的537吨增至1978年的13万吨,增长242倍。农机总动力由1955年的1,809马力增至1978年的59万马力,增长326倍。机耕面积由1960年13.1万亩(1955年数字没有)增至1978年的148万亩,增长10倍。但是粮食总产仅由1955年的19.4亿增至1976年的28.3亿,只增长68.5%。农业总产值由1955年的2.36亿元增至1977年的5.5亿元,只增长1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手段如机、电排灌设备(在第一阶段主要靠塘坝自流灌溉)、化肥等在农业生产中已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也确实反映出对已形成的生产条件的利用效率是比较低的(当然,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下,各项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1979年至1981年粮食生产情况及其分析

1978年由于旱灾严重(受灾面积达400多万亩),粮食产量由1977年的28亿斤下降为22.9亿斤。1979年实行包产到组,生产恢复很快,虽然这年还是受旱(受灾面积200多万亩),

但粮食总产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8.33 亿斤。化肥从 1978 年的 12.9 万吨增至 15.9 万吨。夏收总产 8.03 亿斤，超过了 1978 年(1978 年夏收是历史最高水平)的 5.2 亿斤。

1980 年，粮食总产达到 32.2 亿斤，比 1979 年净增近 4 亿斤；夏收总产 7.85 亿斤，比 1979 年略有下降，稻谷增产近 4 亿斤；化肥增至 23.98 万吨。

1981 年夏季总产 9.53 亿斤，预计全年总产可达到 38 亿斤，净增 6 亿斤。

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落实了党的农村政策，滁县地区实行了双包到户的联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粮食生产以前所未有的幅度上升，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短短三年时间，粮食年总产净增了 10 亿斤。增产的主要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 扩大耕地面积，提高了土地的外延利用率。原来抛荒的田地(熟荒)现在开垦出来了；扩大了粮食面积，据估计小麦面积已超过了 1955 年，接近 500 万亩。(这个判断是根据下述三条：原有的冬垡田 100 多万亩基本消失了；绿肥 1976 年 130 万亩降至 1980 年的 30 万亩，1981 年近乎绝迹；春播面积缩小了)

(二) 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提高了单产。主要因素为：1. 劳动投入的增加及田间管理的改善。2. 化肥施用量大幅度增长：以天长为例，1980 年全年 2.3 万吨(只及全区的 1/10)，1981 年全年预计 3 万吨(因为 7 月底已达 2.3 万吨)。全区七个县，据此推算，每县多增一万吨，则 1981 年全区化肥施用量在 30—32 万吨，比 1980 年又增加 6—8 万吨。3. 良种的推广。以凤阳县为例，责任制前，杂交稻只有 5,000 亩。现已达到 6 万亩(全县水田 43 万亩)。“99”品种(千斤水平)在责任制之前没有，现已占到 20%。天长、全椒基本上全县实现了良种化。4. 复种

指数提高了，估计在 1.7~1.8。

1981 年能连续大幅度增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气候较好。

从这几个主要因素的变化趋势来看，今后：1. 耕地和粮食面积的扩大已接近饱和。因为熟荒已基本上开垦完毕，而若增加开荒（生荒）将会加剧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2. 复种指数难以继续提高，即便再增加对增产也未必有利。3. 化肥施用量在 3—5 年内能否继续大幅度增长，该地很难控制。因为各地若普遍实行双包到户，化肥将日感短缺。同时，化肥使用的边际收益将会不断递减。虽然该区化肥施用水平不高，但由于土壤有机质含量低（1% 以下），土壤不保水、不保肥，增施化肥将使土壤理化性状继续恶化，而难于收到以前的效果。70 年代前半期，1 斤化肥可增 5 至 6 斤粮，目前已明显下降。1979 年粮产 28 亿，化肥 15.8 万吨；1980 年粮产 32 亿，化肥 23.9 万吨，增 8.1 万吨化肥增 4 亿粮，1 斤化肥增 2.5 斤粮。4. 这几年水利条件基本上没有变化，仍维持在 1978 年以前的水平上。水利条件对于增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双包到户以后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较充分地发挥了原有水利设施的能力。解放以来，该区旱灾而积是上升的，水灾而积有所减轻，而对该区威胁最大的是旱灾。因此，今后水利条件的改变是全区能否持续增产、稳产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这方面的前景并不乐观。一是大型水利工程需国家大量投资，这是难以办到的。二是造林，改土等涵养水源的生物措施短期难以奏效。再加上气候难以控制，且有向不利方向发展的趋势（气候变冷、积温下降）。那么抵御自然干扰、稳定农业均衡生产的能力将难于继续增加。5. 良种的进一步扩大和更新以及劳动投入的继续增加，田间管理的不断改善，其收效大小又取决于水肥条件能否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6. 地力由于肥